

論三國人物

方詩銘 著

方詩銘先生和《論三國人物》

方小芬

方詩銘先生是著名歷史學家，1919年9月生於四川省成都市，1945年畢業於齊魯大學歷史系，師從顧頡剛、陳寅恪、錢穆等史學大師。曾任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名譽所長，兼任《史林》主編等。長期從事中國中古史研究，相關主要著作有《曹操·袁紹·黃巾》《三國人物散論》《論三國人物》等。

方先生研究中國古代史，將重點放在中古這一時期，即從秦漢到魏晉，應該說，這開始於在齊魯大學就讀時。求學期間，先生就在當時的著名刊物《東方雜誌》上發表了《火浣布之傳入與崑崙地望之南徙》《朱應康泰行紀研究》《西王母傳說考》等文，探討的是中西交通史方面的問題。如《火浣布之傳入與崑崙地望之南徙》一文，「火浣布」即石棉，以能用火去除布上的污穢而得名，常理布遇火即化為灰燼，而此布遇水不濕，遇火不燼，頗為神奇，由此而產生了許多傳說。火浣布來自大秦，在《山海經》《博物志》《穆天子傳》等書中都有記載。它是怎樣傳到中國來的，眾說紛紜。先生依據《山海經》《博物志》《海內十洲記》《三國志》《抱樸子》《洛陽伽藍記》等古籍，並參考了馮承鈞《中國南洋交通史》等研究成果，論證了火浣布傳入中國的時間和路線，由於海陸兩路傳入的記載、傳說互為

混合，引起了關於崑崙傳說的南徙。《朱應康泰行紀研究》則是研究三國時期與南海諸國的關係，《梁書·海南諸國傳》云：「海南諸國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洲上……及吳孫權時遣宣化從事朱應、中郎康泰通焉，其所經及傳聞則有百數十國，因立記傳。」所引資料更為廣博，涉及《史記》《漢書》《後漢書》《梁書》《隋書》《新唐書》《舊唐書》《法苑珠林》《太平廣記》《太平御覽》《文選》《南史》等。這些論文廣徵博引，邏輯嚴密，顯示了先生淵博的知識和扎實的功力。這些研究成果很受學界重視，至今仍被相關學者引用。

20世紀80年代中期，方詩銘先生開始專注於研究從東漢末年，中經三國鼎立到西晉的這段歷史。最初是在《歷史研究》《中國史研究》《上海社會科學院學術季刊》《史林》等刊物上連續發表系列性的文章，如《世族·豪傑·遊俠——從一個側面看袁紹》《曹操與「白波賊」對東漢政權的爭奪》《曹操起家與袁曹政治集團》《從士兵來源看曹操軍事力量的發展及其衰落》《孫堅軍事力量的形成壯大及其爭奪荊豫兩州的戰爭》等，1995年全面整理修訂成《曹操·袁紹·黃巾》一書，後又撰寫了專著《三國人物散論》，對史料進行新的發掘和考證。

《論三國人物》是以研究三國時期重要人物為線索的著作。方先生整理了三國史研究過程中所寫的關於人物的論文和札記，並對若干人物做了評述。先生在「前記」中說，研究三國人物的想法來自於他的老師——史學大師顧頡剛先生，顧老曾設想從史學研究的角度寫一部《三國演義》，終因工程過大而未能實現。因而方先生有了新的設想，研究《三國演義》中的英雄人物，根據史料「還其本來面目」，使通俗演義裡的人物更接近歷史真實。

對於中心人物曹操，先生定義為「中國中古時期傑出的政治

家」。研究的角度，也是以政治家為核心。東漢末年是一個動亂的年代，王朝統治危機四伏，災難空前，根源是宦官控制朝政。先生以為曹操是「社會上層的遊俠」，其最高準則為「以救時難而濟同類」，所謂「救時難」指反對宦官的鬥爭，「同類」指參加反宦官鬥爭的人們。在複雜的形勢下，曹操解決了來自外部和內部的危機，在丁沖、鍾繇的協助下，利用楊奉「奉天子以令不臣」，奠定了統一北部中國的基礎。該書首先探討了董卓的興起和覆滅、并州軍事集團的形成，以及袁曹的聯合。其次，論述曹操，包括兩次保衛兗州的戰爭。再次，探討雄踞河北的袁紹，袁曹矛盾的激化，與公孫瓚的爭奪。書中還研究了袁術、呂布、孫堅、孫策、周瑜、劉備、諸葛亮、關羽等人物。該書的特點是切入點新。如寫曹操、袁紹等人物，着重寫其性格中的「遊俠」一面，而同為「遊俠」，層次有高低，氣質有相異；有「氣俠」「輕俠」之分，也有機靈、魯莽之別。先生對三國時期人物的研究，是在深入了解這一時期世態民情的基礎上進行的綜合性研究，每一個研究對象，都追溯家世，釐清其來龍去脈，介紹當地的社會特點，交代其在政治集團中的地位、影響，以及個人性格、氣質、嗜好，與他人的關係、恩怨等，使人物在歷史的大背景下更加鮮活。如袁紹曾經為曹操親征呂布，收復兗州，這是袁曹關係中袁紹有恩於曹操的重大事件，也是袁曹日後翻臉而曹操有虧於袁紹的大事。陳琳在著名的討伐曹操的《為袁紹檄豫州》一文中曾記錄了此事，「幕府（袁紹）惟強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故復援旌擐甲，席捲起征，金鼓響振，（呂）布眾奔沮，拯其（曹操）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位」。但《三國志》中對此卻無任何記載。方先生對此事進行了深入研究，認為從當時情況來看，陳琳為袁紹所作的這篇檄文，凡所列舉的基本是事實，特別是袁紹親

征呂布這樣的大事，陳琳不可能也不應該虛構，否則將是有利於曹操而不利於袁紹，這是袁紹不能同意的。《三國志》有許多地方在為曹操隱諱。又如論及劉備和諸葛亮的關係，就是從研究兩人的家世入手。諸葛亮和劉備皆出身寒微，政治上彼此共通，他們的結合並非偶然。人們熟知的「三顧茅廬」以及《隆中對》，就是在諸葛亮和劉備政治結合的基礎上產生的。通過分析研究三國時期的人物，更清晰地反映出整個時代的風雲變幻，為研究這一時期的政治、經濟、社會狀態開拓了思路。

方先生把東漢末年稱作「群星燦爛的時代」，一個個歷史人物在先生的筆下變得栩栩如生，他甚至能與這些歷史人物共同思想，理解他們的生活、他們的內心世界、他們的喜怒哀樂。先生對學術研究的投入、對史料的理解和駕馭，使他的研究進入了一個全新的境界。

「吾人今日可依據之材料，僅為當時所遺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殘餘斷片，以窺測其全部結構，必須備藝術家欣賞古代繪畫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後古人立說之用意與對象，始可以真了解。」這是陳寅恪先生在《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中所說的，方詩銘先生多年來一直以此自勉。從 20 世紀 40 年代開始到 90 年代末，60 年學術生涯中先生研究的領域涉及歷史學、古典文學、考古學、年代學、版本學等諸多方面，並將此作為自己一生的追求。

目 錄

方詩銘先生和《論三國人物》/ 方小芬	I
前記	1
① 董卓興起於「邊鄙」的涼州	3
② 「安危定傾」	6
③ 董卓與涼州軍事集團	11
④ 董卓之死	15
⑤ 呂布在并州的早年生涯	21
⑥ 呂布與并州軍事集團	25
⑦ 呂布的最後	29
⑧ 「人中有呂布，馬中有赤兔」	32
⑨ 作為「遊俠」之士的曹操	35
⑩ 曹操與袁紹為首的政治集團	37
⑪ 「清平之奸賊，亂世之英雄」	41
⑫ 曹操據有兗州	44
⑬ 「規大河以南以待其變」	50

⑭ 曹操保衛兗州的戰爭	53
⑮ 曹操再次保衛兗州的戰爭	58
⑯ 曹操與袁紹的矛盾和激化	63
⑰ 「奉天子以令不臣」	65
⑱ 「黃巾餘眾」郭泰即「郭大賢」	70
⑲ 「白波賊帥」楊奉	75
⑳ 《三國志》為甚麼不寫丁冲	79
㉑ 以臧霸為首的「泰山諸將」	82
㉒ 世族、豪傑、遊俠——袁紹的一個側面	86
㉓ 袁紹在冀州	92
㉔ 袁紹成為當時最強大的割據者	95
㉕ 袁紹是如何覆滅的	99
㉖ 公孫瓚「文武才力足恃」	105
㉗ 割據幽州的公孫瓚	108
㉘ 公孫瓚與「商販庸兒」	112
㉙ 公孫瓚在袁紹和當地豪族的進攻下失敗	115
㉚ 袁紹與「黑山賊」張燕	119
㉛ 張燕窺伺袁紹的冀州	123
㉜ 袁紹、張燕爭奪冀州的戰爭	128
㉝ 「氣俠」之士袁術	131
㉞ 袁術與孫堅	134
㉟ 袁術、曹操的封丘之戰	138

36 「袁術至於此乎」	142
37 「輕狡」之徒孫堅	146
38 孫堅軍事力量的形成	151
39 孫堅與袁術	154
40 孫堅之死	157
41 「明果獨斷」「勇蓋天下」	161
42 孫策與袁術	164
43 「精兵之地」與「丹陽兵」	168
44 丹陽成為孫策平定江東的根據地	172
45 孫氏父子與會稽大姓強族	176
46 魏滕和虞翻	183
47 吳郡「四姓」與會稽「四族」	187
48 魯肅的早年生涯	190
49 周瑜與孫吳建國	194
50 周瑜與赤壁之戰	198
51 「劉備寄寓，有似養虎」	202
52 「梟雄」劉備	207
53 劉備與公孫瓚	211
54 劉備被擁戴為徐州牧	215
55 「爭盟淮隅」的失敗	220
56 諸葛亮的家世	224
57 「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	228

58	諸葛亮為甚麼選擇劉備	230
59	《隆中對》	233
60	關羽其人	238
61	關羽與荊州之失	242
62	劉備與關羽	247
63	諸葛亮與法正	251
64	龐統、法正與劉備	255
65	馬超及其在蜀的處境	260
66	李嚴與諸葛亮	268
67	「明惠若神」「慧心大悟」	273
	附：何晏與「玄學」	278
68	「浮華」與何晏	280
69	何晏是曹爽的「腹心」嗎	285
70	高平陵政變中的何晏	290

前記

所謂「三國」，是指曹操開創的魏國、劉備開創的蜀國，以及孫權開創的吳國。一般認為，三國時期是從建安元年起算的。以這一年作為標誌的原因是，曹操將東漢的末代皇帝——漢獻帝，從「白波賊」手裡奪過來，「奉天子以令不臣」，逐漸成為當時最大的割據勢力。這時，不但曹操沒有稱為魏王，劉備還是一名不為人知的小人物，孫權更說不上了。三國鼎立那是後來的事。

由於這是一個風雲變幻、英雄輩出的時代，不但晉朝的陳壽撰寫了著名史書《三國志》，到了南朝的劉宋，由於《三國志》相當簡略，而且「多為時諱」，對當時統治者隱諱粉飾的地方很多，有的地方還彼此矛盾，史學家裴松之就雜採當時或此後的史籍，詳盡地為《三國志》作注，實際是作了大量的補充和糾正。如果說，沒有裴松之的注，僅有《三國志》一書，那麼，後代的人們將無從翔實地了解這個群星燦爛的時代。

這個時代是太豐富多彩了，不但後來的士大夫，即便是民間也流傳過許多關於「三國」，特別是這個時代英雄們的故事。宋朝「說話人」中屬於「講史」一派的就有所謂「說三分」，即講說三國時期的歷史故事，有如現在的「平話」，說大書。元朝至治年間刊行的《三國

志平話》，即是那時「說三分」的腳本，《三國志通俗演義》是後來出現的著名長篇歷史小說。

清代學者章學誠在《丙辰札記》中說：「《三國演義》則七分實事，三分虛構，以致觀者往往為所惑亂。」儘管這個評價是對的，但這部歷史小說實在深入人心，即使他老先生自己作的詩中也用過《三國演義》的典故。

《三國演義》是在民間「說三分」的基礎上，經過知識分子多少年不斷加工修改而成的。但「通俗演義」終究是通俗演義，是否有人能夠寫出一部符合歷史真實的新的《三國演義》呢？顧頡剛先生就這樣設想過。但這個工程實在太大了，恐怕很難實現，因而我有了另一設想，將《演義》上的這些英雄人物，根據現存史料逐個還他們的本來面目。從 1986 年開始，在其他工作之餘，即以人物為中心，以散論的形式，連續寫成論文或札記，迄今為止已積累了若干篇，有的發表過。現將這些長長短短的散論彙為一集，即題為《論三國人物》。

最後還有一點需要說明，本書是從董卓開始的，他似乎不能算作三國時期的人物，但陳壽《三國志》中，除皇帝后妃外，第一篇即是《董卓傳》，這裡不過姑從其例而已。

方詩銘

① 董卓興起於「邊鄙」的涼州

首先，從董卓的家族說起。《三國志·魏志·董卓傳》注引《英雄記》說：「(董)卓父君雅，由微官為潁川綸氏尉。有三子：長子擢，字孟高，早卒；次即卓；卓弟旻，字叔穎。」董卓的父親以微官擔任過潁川郡的綸氏縣尉，是掌管緝捕「盜賊」的武官。董君雅既是武職人員，必然長於騎射，這和他的籍貫是涼州的隴西臨洮分不開的。

當時，涼州是一個特殊地區。《後漢書·陳龜傳》說：「今西州邊鄙，土地瘠塉，鞍馬為居，射獵為業，男寡耕稼之利，女乏機杼之饒。守塞候望，懸命鋒鏑，聞急長驅，去不圖反。」所謂「西州」即指涼州。同書《虞詡傳》說：「諺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觀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為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僅從這兩條史料來看，在當時與「羌胡」長期戰爭的情況下，加以「關西出將」的傳統，從而形成涼州這個地區的特點。「鞍馬為居，射獵為業，男寡耕稼之利，女乏機杼之饒」，內地男耕女織的生活，對這裡來說，幾乎是很難想像的。當然，「土地瘠塉」的自然條件，是出現這種現象的根本原因。涼州的地理因素，加上東漢末年的長期戰亂，必然孕育長於騎射、以鞍馬生活為主的傑出人物，董卓即是其中的典型。

董卓長期生活在這個特殊地區，與「羌胡」雜處，而且被人們視為「羌胡之種」（《後漢書·列女傳》），很可能，其母即非漢族。在這種「邊鄙」環境中，培育了董卓的才能。「卓有才武，膂力少比，雙帶兩鞬，左右馳射。」這是《三國志·魏志·董卓傳》對其才武的描述。《後漢書·董卓傳》作「膂力過人，雙帶兩鞬，左右馳射」，李賢注引《方言》說：「所以藏箭謂之『服』，藏弓謂之『鞬』。」即是說，身負兩弓、騎馬奔馳之際，董卓能夠左右張弓射箭，說明其力量之強和騎術之精。《三國志·魏志·董卓傳》又說：「（董）卓少好俠，嘗遊羌中，盡與諸豪帥相結。」《後漢書·董卓傳》以此為基礎，增加了「以健俠知名」「為羌胡所畏」兩句。說明董卓不但是名遊俠之士，而且以此著稱，在當地具有相當高的知名度，並為「羌胡」所畏懼。又《三國志·魏志·董卓傳》注引《獻帝起居注》說：「（李）傕邊鄙之人，習於夷風。」李傕是此後董卓手下的大將之一。如前所說，涼州被當時人們看作「邊鄙」，李傕是涼州北地郡人，因而被稱為「邊鄙之人」，含有輕蔑之意。至於為甚麼加以輕蔑，十分明顯，即是因為「習於夷風」，長期與「羌胡」雜居，對內地的傳統文化格格不入，屬於低文化層人物。李傕如此，董卓也應該如此。

《三國志·魏志·董卓傳》注引《吳書》說：「郡召（董）卓為吏，使監領盜賊。胡嘗出鈔，多虜民人，涼州刺史成就辟卓為從事，使領兵騎討捕，大破之，斬獲千計。」這裡的「郡」，所指當然是董卓的家鄉隴西郡。從擔任郡吏到州吏，不是「監領盜賊」，就是「領兵騎討捕」，都是武職，這和董卓的「才武」分不開的，郡太守和州刺史所欣賞的，當然也是他的「才武」。

在涼州，董卓擔任過「兵馬掾」，由於這個職務對此後的軍事生涯具有密切關係，這裡有必要作較詳的考察。《後漢書·董卓傳》說：

「(董卓)為(涼)州兵馬掾，常徼守塞下。」關於東漢時期州一級兵馬掾一職，有關史籍沒有具體記載，但在《後漢書》中卻有三條關於郡的兵馬掾的史料。其一見《東夷傳》：「(句驪)復與遼東鮮卑八千餘人攻遼隊，殺略吏人。(遼東太守)蔡諷等追擊於新昌，戰歿，功曹耿耗、兵曹掾龍端、兵馬掾公孫酺以身捍諷，俱沒於陳，死者百餘人。」其二見《烏桓鮮卑傳》：「延平元年，鮮卑復寇漁陽，太守張顯率數百人出塞追之，兵馬掾嚴授諫曰：『前道險阻，賊勢難量，宜且結營，先令輕騎偵視之。』顯意甚銳，怒欲斬之。因復進兵，遇虜伏發，士卒悉走，唯(嚴)授力戰，身被十創，手殺數人而死。」其三見《劉茂傳》：「延平中，鮮卑數百餘騎寇漁陽，太守張顯率吏士追出塞，遙望虜營煙火，急趣之。兵馬掾嚴授慮有伏兵，苦諫止，不聽。(張)顯促令進，(嚴)授不獲已，前戰，伏兵發，授身被十創，歿於陣。」這三條史料所敘述的，一條在遼東郡，另兩條所記是同一事，在漁陽郡，都屬於當時的邊郡，說明「兵馬掾」一職應該專設在與少數民族鄰接的地區，任務是作戰時參與策劃，並身臨前線，交鋒對陣，這是邊郡的重要武職。州一級的「兵馬掾」，其職責應該與郡相同。在這個職位上，董卓不但以他的「才武」徼守塞下，投身戰鬥，而且協助刺史參與謀劃。作為此後的將軍和統帥，涼州兵馬掾任上的這一段經歷，對董卓來說，應該是一次重要的鍛煉。

在涼州，董卓可以充任州郡吏，按照其時慣例，應該屬於當地豪族。

②「安危定傾」

漢桓帝末年，董卓以「六郡良家子為羽林郎，從中郎將張奐為軍司馬，共擊漢陽叛羌，破之」（《後漢書·董卓傳》）。甚麼是「六郡良家子」，因為涉及董卓的出身和此後的發展，這裡有必要加以說明。《漢書·地理志》說：「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為官，名將多出焉。」這裡頗為生動地描述了這一地區的特點。從當時的行政區劃來說，天水、隴西、安定、北地四郡屬於涼州，上郡、西河兩郡屬於并州；但是，以自然條件、民風材力而論，六郡完全相同，並不因為分屬兩州而有所差異。從西漢開始，就從并、涼兩州的六郡「良家子」中，選拔「期門」「羽林」，即皇帝的衛士。這個地區的人們「修習戰備，高上氣力」，這僅是條件之一；此外，還有一個重要條件——「良家子」，他們必須出身「良家」。據《漢書·地理志》注引如淳的解釋，即「醫、商賈、百工不得豫也」。再據《史記·李將軍列傳》索隱：「如淳云：『（良家子）非醫巫、商賈、百工也。』」漢代將「醫巫」「商賈」「百工」的人家認為非「良家」，其子弟也不能作為「良家子」，反之，凡是非上列人家的子弟，即所謂「良家子」。董卓的父親擔任過綸氏

的縣尉，董卓本人也擔任過涼州的州郡吏，當然可以具備入選的條件，成為「期門」「羽林」。董卓由涼州邊鄙之地來到京師洛陽，同時，「六郡良家子」又是名將出身的最好途徑，趙充國、甘延壽即是如此（參看錢文子《補漢兵志》）。對董卓來說，這是一生中的重大轉折。從此，他逐漸參與東漢政府的軍事行動，取得高位，並擁有一支精銳的涼州部隊。

董卓是如何建立並發展他的軍事力量的。

如上所說，在京師洛陽得到中郎將張奐推薦，董卓回到涼州，以軍司馬職位參加了對羌族的戰爭。張奐是董卓的同鄉。《後漢書·張奐傳》說：「張奐字然明，敦煌淵泉人也。父惇，為漢陽太守。」張奐是敦煌郡人，其父張惇又曾任漢陽太守，敦煌、漢陽兩郡都屬於涼州，說明父子兩人在涼州具有較高威望。張奐所以推薦董卓，是欣賞他的「才武」，以及在涼州的知名度。由涼州到京師洛陽，對董卓來說，是一個重大轉折；由洛陽再回到涼州，這又是一個重大轉折。原因很簡單，脫離涼州這個土生土長之地，董卓要發展他的軍事力量，是十分困難的。

《後漢書·張奐傳》說：「永康元年春，東羌、先零五六千騎寇關中，圍祿祜，掠雲陽。夏，復攻沒兩營，殺千餘人。冬，羌岸尾、摩螿等脅同種復鈔三輔。（張）奐遣司馬尹端、董卓並擊，大破之，斬其酋豪，首虜萬餘人，三州清定。」在這次對羌族的戰爭中，董卓顯示了他的軍事才能。戰爭結束後，董卓「拜郎中，賜縑九千匹。卓曰：『為者則己，有者則士。』乃悉分與吏兵，無所留」。為《後漢書》作注的李賢說：「為功者雖己，共有者乃士。」即是說，董卓認為自己雖有指揮之功，但作戰還是要依靠戰士，因此，將賞賜的九千匹縑毫無保留地分給吏卒。十分明顯，僅據這個事例，說明董卓不但「才

武」，而且具有大將或統帥的風度和才能。董卓所以能夠組成以他為首的涼州軍事集團，並控制東漢政府，原因即在於此。

據《後漢書·董卓傳》，在張奐領導下擊破并、涼兩州的羌族後，董卓「稍遷西域戊己校尉，坐事免。後為并州刺史、河東太守。中平元年，拜東中郎將，持節，代盧植擊張角於下曲陽，軍敗，抵罪」。除鎮壓黃巾起義失敗，又見於《後漢書》的《靈帝紀》《皇甫嵩傳》外，在并州刺史、河東太守任上，《三國志·魏志·董卓傳》注引《英雄記》說：「(董)卓數討羌胡，前後百餘戰。」說明其主要任務仍是對付「羌胡」。儘管沒有離開過戰場，董卓卻再次離開了涼州，不在涼州，即是脫離發展的土壤，特別是武裝力量的發展。但是，當鎮壓黃巾起義失敗抵罪之後，幸運卻降臨到董卓身上，不但得以回到涼州，重新組織軍隊，而且迅速發展，成為舉足輕重的人物。

董卓軍敗抵罪在中平元年，就在這年冬天，涼州再度燃燒起反抗東漢政府的烽火。《後漢書·董卓傳》說：「(中平元年)其冬，北地先零羌及枹罕河關群盜反叛，遂共立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玉、李文侯為將軍，殺護羌校尉泠徵。伯玉等乃劫致金城人邊章、韓遂，使專任軍政，共殺金城太守陳懿，攻燒州郡。明年春，將數萬騎入寇三輔，侵逼園陵，託誅宦官為名。」這是一次規模巨大的「羌胡」起兵，東漢政府派左車騎將軍皇甫嵩率軍前往鎮壓。董卓就在同時被任為中郎將，作為皇甫嵩的副手，因而得以再次回到涼州。

皇甫嵩是涼州安定郡人，據《後漢書·皇甫嵩傳》，他是「兵動若神，謀不再計」的傑出將帥。「本朝失政，天下倒懸，能安定危傾者，唯大人(皇甫嵩)與董卓耳。」這是皇甫酈對其叔皇甫嵩說的。說明這時董卓的地位已經和名將皇甫嵩相等，被人們視為可以安定這個戰亂時代的傑出人物。由於皇甫嵩對宦官集團的憎恨，被中常侍張

讓誣陷為「連戰無功，所費者多」，被徵還並遭到處分。這是董卓與皇甫嵩的第一次合作。其間，董卓還以破虜將軍名義，在司空張溫統率下繼續在涼州對邊章、韓遂作戰。《後漢書·董卓傳》說：「(中平)五年，(王國)圍陳倉，乃拜(董)卓前將軍，與左將軍皇甫嵩擊破之。」這是中平五年董卓與皇甫嵩的第二次合作。

《後漢書·皇甫嵩傳》注引《獻帝春秋》說：「初，(董)卓為前將軍，(皇甫)嵩為左將軍，俱征邊章、韓遂，爭雄。」兩雄不並立，所謂「爭雄」，說明兩人之間矛盾的起因，也說明了矛盾的表現。由於董卓手握重兵，東漢政府當然不放心，將他調到京都改任他職，藉以剝奪其兵權。《後漢書·董卓傳》說：「(中平)六年，徵(董)卓為少府，不肯就。上書言：『所將湟中義從及秦胡兵皆詣臣曰：「牢直不畢，廩賜斷絕，妻子飢凍。」牽挽臣車，使不得行。羌胡敝腸狗態，臣不能禁止，輒將順安慰。增異復上。』朝廷不能制，頗以為慮。」董卓擁兵自重，挾「羌胡」以威脅政府，詞氣嚴厲，拒絕前來京師，更拒絕交出軍隊。在這種劍拔弩張的情況下，東漢政府即企圖利用董卓與皇甫嵩之間的矛盾，使皇甫嵩以武力解決董卓。同《傳》又說：「及靈帝寢疾，璽書拜(董)卓為并州牧，令以兵屬皇甫嵩。卓復上書言曰：『臣既無老謀，又無壯事，天恩誤加，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彌久，戀臣畜養之恩，為臣奮一旦之命，乞將之北州，效力邊垂。』於是駐兵河東，以觀時變。」即是說，所率領的軍隊僅屬董卓個人，也只聽其命令，完全可以帶到并州，沒有必要也不可能交給皇甫嵩，詞氣仍舊十分嚴厲。而且董卓既拒絕交出軍隊，又拒絕就任，前赴并州，只是將大軍屯駐在司隸所屬的河東郡，觀看東漢政權內部的變化，也當然觀看皇甫嵩的動態。至於皇甫嵩這方面，儘管其侄皇甫郛對他說：「(董)卓被詔委兵，而上書自請，此逆

命也；又以京師昏亂，躊躇不進，此懷奸也。」並建議「杖國威以討之」（《後漢書·皇甫嵩傳》）。老謀深算的皇甫嵩終於不敢動手，說明其時董卓的武裝力量不但已經和皇甫嵩相等，而且很可能超過了皇甫嵩。

③ 董卓與涼州軍事集團

董卓所掌握的軍事力量，是在涼州形成發展的，前引《後漢書·董卓傳》所說的「湟中義從」和「秦胡兵」即包括在內。關於「湟中義從」，《後漢書·西羌傳》說：「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別也，舊在張掖、酒泉地。……又數百戶在張掖，號曰『義從胡』。中平元年，與北宮伯玉等反，殺護羌校尉泠徵、金城太守陳懿，遂寇亂隴右焉。」說明「湟中義從」是湟中地區的「月氏胡」，曾在北宮伯玉領導下發動過反抗東漢政府的起兵。如前引《董卓傳》所述，這次起兵曾遭到董卓和皇甫嵩的鎮壓。董卓軍隊中的「湟中義從」，其中一大部分應該即是這次戰爭中的降人或俘虜。至於「秦胡兵」，「秦」是指涼州的漢族士兵，「胡」則是指非漢族士兵，即所謂「羌胡」，請參看拙著《釋「秦胡」》一文（《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1979年第1期），這裡不再重複。因此，在上引董卓對東漢政府的第一次上書中，曾強調軍中的「羌胡」，即說明他所掌握的武裝力量，不但有涼州「鞍馬為居，射獵為業」的漢族士兵，還有大量非漢族士兵，不論漢族還是非漢族，他們都是富於戰鬥力的精兵。當時，著名女詩人蔡琰在其名篇《悲憤詩》中，描繪她所親身經歷過的這個戰亂時代，其中有這樣四句：「卓眾來東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來兵皆胡羌。」（《後漢書·列女

傳》對董卓的軍隊及軍中的大量少數民族士兵，即作了十分真實的寫照。

此外，《三國志·魏志·鄭渾傳》注引張璠《漢紀》說：「且天下之權勇，今見在者不過并、涼、匈奴屠各、湟中義從、八種西羌，皆百姓素所畏服，而明公（董卓）權以為爪牙，壯夫震栗，況小丑乎！」這是在董卓與鄭泰的對話中，鄭泰對董卓武裝力量的稱譽。除涼州士兵、湟中義從、八種西羌已見上述外，又增加了并州和匈奴屠各族的士兵，同樣是為「百姓素所畏服」的精兵。這是董卓兼併丁原所屬并州軍隊以後的情況。

至於董卓所部將領，據《三國志》和《後漢書》，有：

（一）李傕 《三國志·魏志·董卓傳》注引《英雄記》說：「（李）傕，北地人。」北地郡屬於涼州，前引《三國志·魏志·董卓傳》注引《獻帝起居注》：「（李）傕邊鄙之人，習於夷風。」李傕在軍中任校尉，是董卓手下的大將之一。當董卓為呂布所殺以後，他成為涼州軍的首領，繼續招引「羌胡數千人」，並有「羌胡大帥」在內（《三國志·魏志·賈詡傳》注引《獻帝紀》），以充實其軍事力量。

（二）郭汜 《三國志·魏志·董卓傳》注引《英雄記》說：「（郭）汜，張掖人，一名多。」張掖郡屬於涼州。同《傳》又引《獻帝起居注》說：「郭多，盜馬虜耳。」說明在從軍以前，郭汜在涼州是一名以盜馬為生的無賴。他在軍中任校尉，也是董卓手下的大將之一。當董卓為呂布所殺以後，他成為涼州軍事集團僅次於李傕的首領。

（三）張濟 據《三國志·魏志·張繡傳》，張濟是武威祖厲人。武威郡屬於涼州。張濟也是董卓軍中的一名校尉。

（四）樊稠 據《三國志·魏志·董卓傳》注引《九州春秋》，在韓遂與樊稠的對話中，韓遂曾說「與足下（樊稠）州里人」。韓遂是涼

州金城郡人，樊稠也應該是涼州人。《後漢書·董卓傳》注引《獻帝紀》說：「(李)傪見(樊)稠果勇而得眾心，疾害之，醉酒，潛使外生騎都尉胡封於坐中拉殺稠。」

(五) 李蒙 《後漢書·董卓傳》說：「(李)傪隨道收兵，比至長安，已十餘萬，與(董)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等合。」前此，李蒙又曾與徐榮奉董卓的命令擊破孫堅，見同《傳》。《後漢紀》卷二八說：「(興平二年)二月，李傪殺右將軍樊稠、撫軍中郎將李蒙。」(「蒙」原作「象」，周天游《後漢紀校注》據《後漢書·董卓傳》注引《後漢紀》改。)

(六) 王方 《三國志·魏志·董卓傳》說：「(李傪等)與(董)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王方等合圍長安城。」與樊稠、李蒙二人相同，王方也是董卓的部曲。

(七) 胡軫(胡文才) 《三國志·魏志·董卓傳》注引《九州春秋》說：「胡文才、楊整修皆涼州大人，而司徒王允素所不善也。及李傪之叛，允乃呼文才、整修使東解釋之，不假藉以溫顏，謂曰：『關東鼠子欲何為邪？卿往呼之。』於是二人往，實召兵而還。」《三國志·吳志·孫堅傳》注引《英雄記》，胡文才名軫。胡文才、楊整修兩人都是涼州大人，所謂「大人」，據《後漢書》，這個詞可以具有多種不同的解釋。《岑彭傳》注：「大人，謂大家豪右。」《馬援傳》注：「大人，謂豪傑也。」「大家豪右」或「豪傑」較為切合胡軫的身份。說明在涼州胡軫應該享有較高威望，為李傪等人所敬重。《後漢書·董卓傳》稱胡軫為「(董)卓故將」，同《傳》注引《九州春秋》說：「(董)卓以東郡太守胡軫為大督。」因此，胡軫的地位當在李傪、郭汜之上。

(八) 楊整修(楊定?) 惠棟《後漢書補注》卷一六說：「整修，即楊定也。興平元年，為安西將軍；二年，遷後將軍。」《後漢書·

董卓傳》說：「安西將軍楊定者，故（董）卓部曲將也。」惠棟的推斷是可能的。餘見上。

（九）段煨 《三國志·魏志·賈詡傳》說：「是時，將軍段煨屯華陰，與詡同郡。」賈詡是武威姑臧人，段煨與之同為武威郡人，武威郡屬於涼州。《後漢書·董卓傳》說：「（董卓）乃使東中郎將董越屯澠池，中郎將段煨屯華陰，中郎將牛輔屯安邑，其餘中郎將、校尉，布在諸縣，以禦山東。」同《傳》又說：「（董）卓所親愛，並不處顯職，但將、校而已。」《資治通鑑》卷五九胡三省注：「將、校謂中郎將、校尉。」因此，段煨應該是董卓的親信。

（一〇）徐榮 《三國志·魏志·公孫度傳》說：「同郡徐榮為董卓中郎將，薦（公孫）度為遼東太守。」公孫度為遼東襄平人，徐榮與之同郡，應該也是遼東人。同書《武帝紀》說：「（曹操）到滎陽汴水，遇（董）卓將徐榮，與戰不利，士卒死傷甚多。」徐榮很可能是董卓軍事力量中唯一非涼州人的大將。《後漢書·董卓傳》說：「（王允）乃遣（董）卓故將胡軫、徐榮擊之（李傕）於新豐，（徐）榮戰死，（胡）軫以眾降。」據前引《九州春秋》，董卓死後，儘管胡軫奉王允之命，阻止李傕進軍長安，「實召兵而還」，支持李傕向東漢政府進攻，而徐榮卻是戰死的，說明他被胡軫、李傕排除在涼州軍事集團之外。

「董卓將、校及在位者多涼州人」（《後漢書·王允傳》），從上述重要軍事人物的情況來看，是完全符合的。以董卓本人為統帥，以李傕、郭汜等人為將領，下面是涼州的漢族和非漢族，並以「羌胡」為主的精兵，從而組成了富於戰鬥力的涼州軍事集團，這是董卓起家，以及最後控制東漢政權的資本。

④ 董卓之死

如前所說，董卓抗拒東漢政府的命令，既不交出軍隊，也不前往并州赴任，而是屯駐河東「以觀時變」，窺視京都洛陽政局的變化。

東漢政府內部這時有三種政治勢力存在。首先是宦官，他們盤踞宮廷，挾持小皇帝和皇太后，並控制政府，這是一股盤根錯節的政治勢力。其次是以弘農楊氏、汝南袁氏為代表的世族高門。「四世居三公位，勢傾天下」，即是對當時汝南袁氏的描述。最後則是輔政的大將軍何進，在他周圍為之出謀劃策的，據《後漢書·何進傳》，主要是「素善養士，能得豪傑用」的汝南袁氏的袁紹，以及其從弟「尚氣俠」的袁術。特別是袁紹掌握有一個以他為首的政治集團，包括曹操在內，他們都是年輕的才智之士，在政治上具有不可忽視的潛在力量。

《後漢紀》卷二五說：「(何)進以(袁)紹為司隸校尉，王允為河南尹，乃召武猛都尉丁原、并州刺史董卓，將兵向京師，以脅太后。」這是袁紹為何進所作的策劃，即召集手握重兵的董卓和丁原兩人。率軍前來洛陽，威脅太后同意誅滅宦官。董卓統率的涼州兵屯駐河東，丁原的并州兵則屯駐河內，並、涼兩支勁旅，成為何進所依靠的主要軍事力量。

董卓得到何進命令，立即進軍洛陽。當涼州兵尚未抵達之際，東漢政府內部已發生變亂，何進為宦官所殺，宦官也為袁紹所消滅。這時可以左右政局的，除董卓外，僅有手握并州勁旅的丁原，這是唯一可以與董卓分庭抗禮的人物。如何對付丁原這個強敵？這是董卓在京師洛陽首先需要解決的重大問題。《後漢書·呂布傳》說：「靈帝崩，（丁）原受何進召，將兵詣洛陽，為執金吾。會（何）進敗，董卓誘（呂）布殺原，而併其兵。卓以布為騎都尉，誓為父子，甚愛信之。稍遷至中郎將，封都亭侯。卓自知凶恣，每懷猜畏，行止常以布自衛。」呂布以「驍武」得到丁原重視，「大見親待」，成為丁原手下最為親信的將領。董卓如何誘使呂布殺死丁原，從而兼併了并州軍，史籍上沒有明確記載。如前所說，董卓曾在并州作戰，又擔任過并州刺史，呂布是五原九原人，五原郡屬於并州，十分可能，兩人之間不但認識而且具有較為密切的關係。否則呂布來自敵方營壘，而且屬於丁原親信，董卓為甚麼「愛信」「行止常以（呂）布自衛」，將自己的生命完全交付給呂布，應該即是最好的說明。

解決丁原，兼併了并州軍隊，而且在此之前，「何進及弟（何）苗先所領部曲，皆歸於卓」。從此，董卓憑藉所掌握的武裝力量，成為具有條件控制東漢政府的唯一權力人物。

如何安撫當時的世族高門，《後漢書·董卓傳》說：「（董）卓乃與司徒黃琬、司空楊彪俱帶鈇鑕，詣闕上書，追理陳蕃、竇武及諸黨人，以從人望。於是悉復蕃等爵位，擢用子孫。」黃琬、楊彪是身居高位的世族代表人物，董卓這一行動，當然得到他們的支持。其次則是對當時的才智之士，即所謂「名士」，加以爭取，對董卓來說，這是更為重要的問題。董卓久在涼州，長期擔任武職，與名士們之間不可能具有聯繫；而且「習於夷風」的涼州將校，以及董卓本人，要

取得名士們的好感，也極為困難。如何爭取，所迫切需要的，是一個能為之牽線搭橋的人物，其時最符合條件的，在董卓眼中只有周毖其人。為甚麼？這裡需要作必要考察。

周毖，《後漢書·董卓傳》作「周珌」，注引《英雄記》作「周毖」。《三國志·魏志》的《董卓傳》、《蜀志》的《許靖傳》，以及《後漢紀》卷二一，皆與《英雄記》同。據《英雄記》，周毖是武威人，《許靖傳》和《後漢書·董卓傳》作漢陽人，不論武威還是漢陽郡，都屬於涼州，周毖與董卓是同鄉。這是第一點。《後漢書·獻帝紀》注引《東觀漢記》說：「周珌，豫州刺史（周）慎之子也。」周毖是周慎的兒子，而周慎則是董卓在涼州對邊章、韓遂作戰時的同僚。《後漢書·董卓傳》說：「邊章、韓遂等大盛，朝廷復以司空張溫為車騎將軍、假節，執金吾袁滂為副，拜（董）卓破虜將軍，與蕩寇將軍周慎並統於（張）溫，並諸郡兵步騎合十餘萬，屯美陽。」這時董卓對周毖應該已經熟知。這是第二點。在京都洛陽，周毖屬於「名士」，成為董卓和「名士」們之間牽線搭橋的人物，這是完全可能的。

《後漢書·董卓傳》說：「（董）卓素聞天下同疾闔官誅殺忠良，及其在事，雖行無道，而猶忍性矯情，擢用群士。」所擢用的「群士」中，當然首先是周毖，被任為吏部尚書，並在他的策劃下，「進退天下之士，沙汰穢濁，顯拔幽滯」。除侍中伍瓊、尚書鄭泰、長史何顯等人外，董卓又徵處士荀爽為平原相，途中再任為光祿勳，到京都洛陽不過三天，更任為司空。「爽自被徵及登台司，九十五日。」（《後漢書·荀爽傳》）至於對著名文士蔡邕的「甚見敬重」，所謂「三日之間，周歷三台」（《後漢書·蔡邕傳》），更是人所共知的故事。對被宦官所壓抑的所謂「幽滯」之士，董卓也「多所顯拔」，付以重任，韓馥為冀州刺史，劉岱為兗州刺史，孔伉為豫州刺史，張咨為南陽太守。

如上所引《後漢書·董卓傳》，董卓「所親愛，並不處顯職，但將、校而已」。所擔任的不過是中郎將和校尉。

董卓企圖拉攏世族、名士，希望得到他們的支持；但是，對來自涼州邊鄙「習於夷風」的董卓，一部分世族、名士仍然是反對的。與董卓公開決裂或潛逃出奔的，就有袁紹、袁術、曹操等人。《後漢書·袁紹傳》說：「時侍中周毖、城門校尉伍瓊為（董）卓所信待，瓊等陰為（袁）紹。」《三國志·魏志·袁紹傳》作「侍中周毖、城門校尉伍瓊、議郎何顥等，皆名士也，（董）卓信之，而陰為紹」。說明儘管董卓對這些名士十分信任，但名士們仍然暗地支持袁紹。這裡有一個問題需要附帶加以討論，即周毖是否也暗地支持袁紹，反對董卓。如果僅據《三國志》，支持袁紹的是三人——周毖、伍瓊、何顥，但《後漢書》所述為董卓「所信待」的是周毖、伍瓊，周毖名列伍瓊之前，而「陰為（袁）紹」的則是「瓊等」，將周毖排除在外，即是說，伍瓊等人的謀劃，周毖未曾與聞。我認為，這個記載是合理的，周毖一直忠於董卓。

儘管如此，董卓挾天子而令諸侯，仍基本上控制了東漢政權。在袁紹號召下，關東雖然發動討伐董卓的戰爭，也沒有可能動搖他的統治。董卓失敗的原因，不是來自外部，而是在於軍隊內部矛盾的激化。

如前所說，董卓利用呂布，誘使殺死丁原，從而兼併了并州軍。儘管董卓對呂布十分信任，「誓為父子」；但是，在并、涼軍事力量之間，卻矛盾突出，甚至處於敵對狀態。為甚麼？理由應該較為簡單，即并州軍被董卓兼併，是不會完全甘心的，又必然處於被壓抑的地位。而涼州軍則是以勝利者自居，沒有將并州軍放在眼裡，甚至對呂布也不例外。《後漢書·董卓傳》說：「孫堅收合散卒，進屯梁縣之陽人。（董）卓遣將胡軫、呂布攻之。布與軫不相能，軍中自驚恐，

士卒散亂。(孫)堅追擊之，軫、布敗走。」注引《九州春秋》說：「(董)卓以東郡太守胡軫為大督、呂布為騎督。(胡)軫性急，豫宣言：『今此行也，要當斬一青綬，乃整齊耳。』(呂)布等惡之，宣言相警云『賊至』，軍眾大亂奔走。」胡軫是「涼州大人」，在涼州軍中享有崇高聲望。在這次戰爭中，胡軫為「大督」，位置在擔任「騎督」的呂布之上，屬於全軍統帥。由於呂布和胡軫的「不相能」，即有并州和涼州軍之間的突出矛盾，尤其是胡軫對并州軍的敵視。所謂「要當斬一青綬」，據《後漢書·呂布傳》，這時呂布的職位是中郎將，《續漢書·百官志》說中郎將是比二千石的官，再據《漢書·百官公卿表》「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綬」，因此，胡軫所說的「青綬」即指呂布。這種公開「宣言」，必然激起呂布和并州軍的仇恨，從而導致全軍不戰自潰。這是并、涼兩支軍事力量矛盾和敵視的典型事例。

《太平御覽》卷五五引《典略》說：「董卓雖親愛呂布，然時醉則罵，以刀劍擊之，不中而後止。」《後漢書·呂布傳》說：「(呂布)嘗小失(董)卓意，卓拔手戟擲之，布拳捷，得免，而改容顧謝，卓意亦解。布由是陰怨於卓。卓又使布守中閣，而私與傅婢情通，益不自安。」呂布對董卓的暗中不滿，以及內心的「益不自安」，對并、涼兩支軍事力量之間的矛盾來說，更起了直接激化的作用。

東漢政府中身居高位而又對董卓陰懷不滿如司徒王允等人，他們利用了這個矛盾。《三國志·魏志·呂布傳》說：「司徒王允以(呂)布州里壯健，厚接納之。」王允是太原祁縣人，太原郡屬於并州，與呂布同「州里」。王允利用了這種同鄉關係，對呂布極力拉攏，目的很明顯，在於假呂布之手以除掉董卓。并、涼兩支軍事力量的矛盾終於激化，王允等人實現了他們的政治圖謀，乘涼州軍大部在關東討伐袁紹等之際，呂布刺殺了董卓。

雖然李傕、郭汜等人繼續掌握涼州軍，並再度控制東漢政府，但這僅是曇花一現，涼州軍事集團最後四分五裂以致瓦解，董卓控制東漢政權，挾天子以令諸侯的事業也完全失敗。至於史籍中，如《三國志》和《後漢書》的《董卓傳》，其所描述的大量殘暴「凶恣」的行徑，即使完全屬於事實，鑑於董卓等人出自當時涼州這樣的地區，而又出自「習於夷風」的低文化層，也不能如舊史那樣據此對董卓簡單地加以否定。

⑤ 呂布在并州的早年生涯

儘管《三國志》和《後漢書》都有呂布的列傳，其他列傳中提到呂布的地方也不少，一般說來，都詳於他的後半生，很少涉及他的早年生涯。《三國志·魏志·呂布傳》說：「呂布字奉先，五原郡九原人也。以驍武給并州。刺史丁原為騎都尉，屯河內，以布為主簿，大見親待。」《後漢書·呂布傳》僅將「驍武」改作「弓馬驍武」，基本相同。呂布在得到丁原賞識以前，即他在并州的早年生涯，對人們說來，是一個謎。是不是呂布的這段經歷完全無法了解呢？回答是否定的。儘管由於史料不足，不能正面了解呂布的這段歷史，但是，如果從某些跡象，或從某個側面，仍舊可以顯示出一定的真實情況。

《三國志·魏志·呂布傳》說：「司徒王允以（呂）布州里壯健，厚接納之。」據同《傳》陳宮對陳留太守張邈的說詞，「呂布壯士，善戰無前」，「壯健」當即「壯士」。《後漢書·王允傳》又說：「（王允）素輕（呂）布，以劍客遇之。」王允是并州太原郡祁縣人，「世仕郡為冠蓋」。說明在大姓豪族代表人物王允的心目中，呂布不過是并州同鄉中的一名「壯健」或「劍客」，而他之所以厚加接納，目的僅是在於實現他的政治圖謀，即利用呂布以刺殺董卓。這就為人們提出一個問題，為甚麼呂布遭到大姓士族和大官僚們如此輕視，以致呂布殺死

董卓有功，被東漢政府任為奮武將軍、進封溫侯之後，王允還繼續將他看作「劍客」？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不能不追溯呂布的出身，以及他早年在并州的生涯。「劍客」「壯士」兩詞，是開啟這個謎的鑰匙，因此，這裡有必要進行較為深入的考察。

「劍客」一詞，在漢代的史籍中，是不止一次出現的，如《漢書》的《東方朔傳》《李陵傳》，《後漢書》的《馬援傳》《劉陶傳》等。《李陵傳》敘述李陵在漢武帝面前陳說自己的部屬是：「皆荆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劉陶傳》也說：「(順陽)縣多奸猾，(劉)陶到官，宣募吏民有氣力勇猛，能以死易生者，不拘亡命奸賊，於是剽輕劍客之徒過晏等十餘人皆來應募。」這兩條史料很重要，也很典型。李陵所部，其中有「劍客」，因為是對漢武帝陳述，他只是強調了他們能夠「力扼虎，射命中」，但這僅是這類人物的特點之一，即勇猛的一面，至於另外的一面，則略而不提。劉陶在順陽的措施，可以說明「劍客」的另一特點。為了對付「奸猾」，劉陶不論其是否「亡命奸賊」，只要「氣力勇猛」，都可以前來應募，因此，應募的人中就有過晏等十幾個所謂「剽輕劍客之徒」。十分明顯，「亡命奸賊」和「氣力勇猛」，即是「劍客」這類人物的兩個方面，也是他們的兩個特點。劉陶利用「剽輕劍客」以對付「奸猾」，這是一種以毒攻毒的辦法。所謂「亡命奸賊」，具體指的是甚麼，從「剽輕劍客」的「剽輕」二字，即可以說明。《後漢書·袁紹傳》說：「儻狡鋒俠。」李賢注引《方言》：「儻，輕也。」又說：「『儻』或作『剽』，劫財物也。」說明「剽」「輕」二字意義相同，一般來說，這是剽悍輕銳的意思，但李賢在這裡特別提到劫奪財物，是有根據的，也是有見地的。同書《王渙傳》說：「(王)渙少好俠，尚氣力，數通剽輕少年。」李賢注：「剽，

劫奪也。」這不但可以為「剽輕」二字的解釋作補充，而且王渙本人是遊俠，既勇猛尚氣力，又一貫與所謂「剽輕少年」聯繫，目的很明顯，即糾合一幫人以武力劫奪財物。至於「壯士」，《後漢書·虞詡傳》說：「(虞詡)及到官，設令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史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為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喪服而不事家業為下。收得百餘人，詡為饗會，悉貫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說明「壯士」也與「劍客」的性質相同。根據這裡所考察的當時「劍客」「壯士」的行徑，從而也就為呂布在并州的早年生涯作了寫照，他之所以一貫遭到大姓士族和大官僚的輕視，絕不是偶然的。

東漢末年是一個遊俠橫行的時代，其層次也是有高低的。荀悅《漢紀》卷一〇說：「遊俠之本，生於武毅，不撓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見危授命，以救時難而濟同類，以正行之者謂之武毅，其失之甚者至於為盜賊也。」荀悅是當時著名政論家，表面上所表述的是西漢武帝時的情況，實際則是在評論當代的遊俠。荀悅指為「盜賊」的這類遊俠，即當時所謂「輕俠」，王渙屬於這個類型，是遊俠中層次最低的。《三國志》的《諸葛誕傳》《劉曄傳》《魯肅傳》《凌統傳》《賀齊傳》等，都出現過「輕俠」這個詞，而具體描述輕俠行徑的是《甘寧傳》：「(甘寧)少有氣力，好遊俠，招合輕薄少年，為之渠帥。群聚相隨，挾持弓弩，負毳帶鈴，民間鈴聲即知是(甘)寧，……至二十餘年，止不攻劫。」裴松之注引《吳書》說：「(甘)寧輕俠殺人，藏舍亡命，聞於郡中。」甘寧這種殺人越貨的行徑，與王渙相同，正是荀悅所斥責的「其失之甚者至於為盜賊也」。呂布的「驍武」或「弓馬驍武」，類似於甘寧的「少有氣力」和「挾持弓弩」，而「劍客」當時又被稱為「剽輕劍客」，殺人越貨，也應該是呂布早年在并州的行徑之一。根據當時

情況，「劍客」「壯士」與「輕俠」一般是可以畫等號的，因此，呂布又應該是一名并州的「輕俠」之士。

「輕俠」是遊俠中層次最低的人物，一般說來，其特點是「驍武」「尚氣力」，並從事「攻劫」，由於他們勇而無謀，又易為人們所利用。這種性格即表現在呂布身上。

⑥ 呂布與并州軍事集團

識拔呂布的并州刺史丁原，是并州軍統帥，他與涼州軍統帥董卓，都得到大將軍何進的重視。《後漢紀》卷二五說：「(何)進以(袁)紹為司隸校尉，王允為河南尹，乃召武猛都尉丁原、并州刺史董卓將兵向京師，以脅太后。」這是袁紹為何進所作的建議，即召集擁有強兵勁旅的猛將，率兵前來京師洛陽，威脅太后同意誅滅宦官。董卓這時雖已被任為并州刺史，並未上任，所統率的仍是涼州兵；丁原離開并州，這時以武猛都尉名義屯駐河內，所統率的也仍舊是并州舊部。并、涼兩支勁旅，成為何進所依靠的主要軍事力量。

并州與涼州的士兵勇敢善戰，當時被稱為「并涼勁兵」。由於并、涼兩州邊鄰匈奴、西羌等少數民族，這裡的廣大人民經常處於與這些少數民族貴族的戰鬥當中，甚至婦女也可以「載戟挾矛，弦弓負矢」。當時人們看來，并、涼士兵屬於「天下之權勇」，為「百姓素所畏服」(《三國志·魏志·鄭渾傳》注引張璠《漢紀》)。并州是產生「武勇」之士的地區，也是「武勇」之士得以發揮他們才力的地區。在丁原的并州軍中，屬於呂布這種類型的人物也不止一個，這不但加強了并州軍的戰鬥力量，並為此後以呂布為中心組成并州軍事集團創造了條件。

與呂布出身和經歷相同的，可以從《三國志》中找到兩人，這就是張楊和張遼。《張楊傳》說：「張楊字稚叔，雲中人也。以武勇給并州，為武猛從事。……并州刺史丁原遣（張）楊將兵詣（蹇）碩，為假司馬。」《張遼傳》說：「張遼字文遠，雁門馬邑人也。少為郡吏。漢末，并州刺史丁原以（張）遼武力過人，召為從事，使將兵詣京都。」從籍貫上說，呂布是五原人，張楊是雲中人，張遼是雁門人，五原、雲中、雁門三郡都屬於并州，這是其一。其二，呂布「驍武」，張楊「武勇」，張遼也「武力過人」，才力完全相同。其三，他們都以這方面的才力為丁原所賞識，在并州得到「司馬」（呂布的職位，《三國志》《後漢書》的《呂布傳》都作「主簿」，這裡根據《後漢紀》卷二五，《資治通鑑》卷五九也從《後漢紀》、「武猛從事」或「從事」這種高級武職。後來他們成為并州軍事集團的主要人物。

不久，董卓利用呂布，誘使背叛並殺死丁原，從而兼併了并州軍。儘管董卓極力拉攏呂布，「誓為父子」，但并、涼兩支軍事力量之間，仍存在矛盾，甚至處於敵對狀態。《後漢書·董卓傳》說：「孫堅收合散卒，進屯梁縣之陽人。（董）卓遣將胡軫、呂布攻之。布與軫不相能，軍中自驚恐，士卒散亂。堅追擊之，軫、布敗走。」李賢注引《九州春秋》說：「（董）卓以東郡太守胡軫為大督，呂布為騎督。（胡）軫性急，豫宣言：『今此行也，要當斬一青綬，乃整齊耳。』（呂）布等惡之，宣言相警云『賊至』，軍眾大亂奔走。」胡軫字文才（《三國志·吳志·孫堅傳》注引《英雄記》），屬於所謂「涼州大人」（《三國志·魏志·董卓傳》注引《九州春秋》），在涼州軍中具有崇高地位。在這次戰爭中，胡軫為「大督」，位置在擔任「騎督」的呂布之上，是全軍統帥。由於胡軫和呂布的「不相能」，尤其是胡軫對并州軍的敵視，「要當斬一青綬」，所謂「青綬」指呂布。《後漢書·呂布傳》

說：「(董)卓以(呂)布為騎都尉。」《續漢書·百官志》說騎都尉是比二千石的官，據《漢書·百官公卿表》，「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綬」，因此，胡軫所說的「青綬」當然即是呂布。這更引起呂布等人的仇恨，從而導致全軍不戰自潰。這是并、涼軍事力量相互矛盾和敵視的典型事例。《太平御覽》卷五五引《典略》說：「董卓雖親愛呂布，然時醉則罵，以刀劍擊之，不中而後止。」《後漢書·呂布傳》說：「(呂布)嘗小失(董)卓意，卓拔手戟擲之。布拳捷得免，而改容顧謝，卓意亦解，布由是陰怨於卓。卓又使布守中閣，而私與傅婢情通，益不自安。」呂布對董卓的暗中不滿，以及內心的「益不自安」，對并、涼兩支軍事力量之間的矛盾來說，更起了直接激化的作用。

東漢政府中密謀誅殺董卓的大官僚王允等人，利用了這個矛盾。如前所說，王允曲意結納呂布，並誘使刺殺了董卓。從此，并州軍從涼州軍的束縛壓制下解脫出來，重新成為一支獨立的軍事力量，並逐漸形成并州軍事集團。以呂布為主的并州軍事集團，其成員為：

(一) 張遼 張遼是并州所屬雁門郡人，其出身和早年經歷應該與呂布相似。後來，張遼為并州刺史丁原所派遣，率領并州勁旅前赴京師洛陽，又受大將軍何進委派回到河北募兵。待到從河北重返洛陽時，丁原已死，并州軍為董卓所兼併，張遼也率部歸附董卓。呂布殺死董卓之後，張遼「以兵屬呂布」，這支部隊後來成為并州軍事集團的主要力量之一。

(二) 張楊 張楊是并州所屬雲中郡人，其出身和早年經歷也應該與呂布類似。後來并州刺史丁原響應東漢政府號召，派張楊率領并州勁兵前赴京師洛陽。與張遼相同，他也受大將軍何進委派，回并州募兵。當丁原被害、并州軍遭到董卓兼併時，他留在并州的上黨郡，拉起一支幾千人的隊伍，起兵反對董卓，並與匈奴單于於夫羅

聯合。丁原的部隊曾經屯駐河內，這裡本來是并州軍的地盤。不久，張楊即在河內站定腳跟，又從董卓所控制的東漢政府取得河內太守名義。「(張) 楊素與呂布善」，他的這支部隊後來也成為并州軍事集團的主要力量之一。

從史籍留下的記載，至少可以知道，在擺脫涼州軍控制後逐漸形成的并州軍事集團，包括了呂布、張遼、張楊等三支武裝力量。張楊的地盤在河內，與呂布一直保持着密切聯繫；張遼雖然「以兵屬呂布」，但他以北地太守或魯相名義（《三國志·魏志·張遼傳》，同書《蜀志·劉備傳》注引《英雄記》），在呂布軍中仍保持相對的獨立地位。呂布、張遼、張楊三人組合的并州軍事集團，他們擁有強勁武裝，先後取得一定地盤，成為當時重要的割據勢力之一。

⑦ 呂布的最後

呂布刺殺董卓後，并州與涼州兩支軍事力量之間更勢同水火。《後漢書·董卓傳》說：「(李) 傕、(郭) 汜以王允、呂布殺董卓，故忿怒并州人，并州人其在軍者男女數百人，皆誅殺之。」李傕、郭汜是涼州軍的重要人物，他們採取殺盡軍中并州人的殘酷行動，是必然的。《三國志·魏志·呂布傳》說：「(呂) 布自殺(董) 卓後，畏惡涼州人，涼州人皆怨。由是李傕等遂相結還攻長安城，布不能拒，傕等遂入長安。」從呂布說來，排斥涼州軍的李傕、郭汜等人，這也是必然的。兩支軍事力量之間的戰爭，以呂布失敗率軍退出長安而宣告結束。

《三國志·魏志·呂布傳》注引《英雄記》說：「(張) 楊及部曲諸將，皆受(李) 傕、(郭) 汜購募，共圖(呂) 布。布聞之，謂楊曰：『布，卿州里也，卿殺布，於卿弱。不如賣布，可極得傕、汜爵寵。』(張) 楊於是外許汜、傕，內實保護布。汜、傕患之，更下大封詔書，以(呂) 布為潁川太守。」當呂布被袁紹利用，為其大破黑山軍張燕之後，險為袁紹謀害，從而來到河內依靠張楊。并州軍的呂布、張遼、張楊集合在一起，對涼州軍的李傕、郭汜來說，當然是嚴重威脅。他們首先進行分化，誘使張楊及其部曲諸將殺死呂布。在張楊看來，這具有相當大的誘惑力，因為不但可與涼州軍暫時和解（他在

河內，與呂布不同，沒有與涼州軍直接衝突過），而且可以兼併呂布部隊，以擴大自己的軍事力量。「布，卿州里也，卿殺布，於卿弱。」呂布的這番話，指出他與張楊同屬并州軍事集團，唇齒相依，如果內部火併，呂布被殺，張楊也必然勢孤，無疑將為涼州軍所攻滅。權衡輕重，張楊不得不放棄這個如意算盤。表面上，他敷衍李傕、郭汜，實際卻大力保護呂布。在這種情況下，李傕、郭汜只得反過來籠絡呂布，任他為潁川太守。呂布得到潁川這塊地盤，有了立腳之地，而潁川、河內兩郡又相互鄰接，從此，并州軍事集團力量也日益壯大。

割據兗州的曹操與陳留太守張邈，以及當地大姓豪族之間，矛盾日益激化。曹操謀士、也是當地大姓豪族代表人物的陳宮，乘曹操東征徐州陶謙的有利時機，勾結反對曹操的一批人，準備起兵，將曹操逐出兗州。《三國志·魏志·呂布傳》說：「（陳）宮說（張）邈曰：『今雄傑並起，天下分崩，君以千里之眾，當四戰之地，撫劍顧眄，亦足以為人豪，而反制於人，不亦鄙乎？今州軍東征，其處空虛，呂布壯士，善戰無前，若權迎之，共牧兗州，觀天下形勢，俟時事之變通，此亦縱橫之一時也。』邈從之。」陳宮的建議很明白，他們之所以利用呂布，是看中他的「善戰無前」。實際上，陳宮對呂布是輕視的，僅將他當作一名「壯士」使用，陳宮說詞中用了一個「權」字，就可以清楚地說明這一點。曹操謀士程昱也看出，陳宮等人對呂布是「以勢假合，不能相君」（《三國志·魏志·程昱傳》），不過是利用呂布而已。儘管濮陽一戰，曹操十分狼狽，幾乎為呂布的軍隊所俘，但在袁紹的大力支持下，終於大敗呂布，收復兗州。這次戰爭，呂布被利用，失敗後只得東奔徐州依附劉備，不久即攻破劉備，奪取徐州。

由於呂布僅是一名「輕俠」型的人物，一貫為當時的大姓豪族所輕視，在徐州，大姓豪族對呂布仍是反對的，其中的代表人物是陳

珪、陳登父子。陳珪是下邳淮浦人，「歷世著名」。《後漢書·陳球傳》注引謝承《後漢書》說：「(陳)球弟子珪，字漢瑜。舉孝廉，劇令，去官。舉茂才，濟北相。(陳)珪子登，字元龍，學通今古，處身循禮，非法不行，性兼文武，有雄姿異略，一領廣陵太守。」當呂布與袁術準備聯合之際，陳珪深恐「徐、揚合從，將為國難」，因勸說呂布投靠已控制東漢政府的曹操，並說服呂布派遣陳登到許縣「奉表謝恩」，從而陳登得以建議曹操及早消滅呂布。曹操當然十分高興，任陳登為廣陵太守，並命「陰合部眾以為內應」(《三國志·魏志·呂布傳》)。當曹操進攻呂布時，陳登即率領廣陵郡兵「為軍先驅」(《三國志·魏志·呂布傳》注引《先賢行狀》)，在曹操消滅呂布的戰爭中起了一定作用。

呂布為曹操所殺，張遼投降，後來成為曹操的五員名將之一。至於張楊，《三國志·魏志·張楊傳》說：「(張)楊素與呂布善，太祖(曹操)之圍布，楊欲救之，不能。乃出兵東市，遙為之勢。其將楊醜，殺楊以應太祖。(張)楊將眭固殺醜，將其眾，欲北合袁紹。太祖遣史渙邀擊，破之於犬城，斬固，盡收其眾。」說明當呂布被圍時，張楊曾擬援救，以河內、徐州之間距離遙遠，是不可能的，只得「出兵東市，遙為之勢」。這裡的「東市」，《三國志集解》引胡三省說：「野王縣東市也。」又引趙一清說：「河內郡野王有射犬聚，東市亦當在其處。」都認為這是野王縣的市。如果張楊僅出兵野王縣東市，對被圍困在徐州的呂布來說，如何能「遙為之勢」呢？這是難於理解的。聯繫到當時形勢，很可能「東市」是「東郡」之誤。東郡屬於兗州，是軍事要地，張楊出兵進攻曹操後方，藉此緩和曹操對徐州的圍攻，這樣才能夠與呂布遙相呼應。不久，部將楊醜殺死張楊，響應曹操，而楊醜又為張楊部將眭固所殺。當眭固準備將這支并州軍拖回河北投奔袁紹時，為史渙所破，眭固被殺，這支軍隊也可能為曹操收編，併入張遼所部。

⑧「人中有呂布，馬中有赤兔」

《太平御覽》卷四九六引《曹操別傳》說：「呂布驍勇，且有駿馬，時人為語曰：『人中有呂布，馬中有赤兔。』」《三國志·魏志·呂布傳》注引《曹瞞傳》說：「時人語曰：『人中有呂布，馬中有赤兔。』」《太平御覽》卷八七九引《曹瞞傳》也說：「呂布有駿馬名赤兔，常騎乘之，時人為之語曰：『人中有呂布，馬中有赤兔。』」《三國志·魏志·呂布傳》也說：「(呂)布便弓馬，膂力過人，號為飛將。」這是當時人們對呂布的最高讚譽。但是，這也十分明白，人們所讚譽的，僅限於他的驍勇，而不是其他。即是說，除此之外，人們對他的評價是不高的。曹操的重要謀士程昱對呂布十分輕視，認為「粗中少親，剛而無禮」，不過是一名「匹夫之雄」(《三國志·魏志·程昱傳》)。曹操的另兩位重要謀士荀攸、郭嘉也對呂布作了「勇而無謀」的評語(《三國志·魏志·荀攸傳》)。此外，當時大姓豪族的代表人物陳登在曹操座中同樣評論說「勇而無計，輕於去就」(《三國志·魏志·呂布傳》)，也表示出他對呂布的極端輕視。這些評價都是來自曹操方面。如前所說，曹操的敵手陳宮、張邈兩人曾利用呂布為他們火中取栗，奪取曹操所據有的兗州，他們的評論是，「呂布壯士，善戰無前」，所看中的仍是他的武勇。「驍勇」「善戰」，以及「勇而無謀」「勇

而無計」，這就是當時人們對呂布所作的全面評價，並勾畫出呂布這個人物的才力和性格。所謂「匹夫之雄」和「壯健」，不就是「劍客」「輕俠」「壯士」嗎！

呂布所統率的并州部隊，長於騎射，是一支騎兵勁旅，如前所說，呂布曾在董卓軍中任過「騎督」。當呂布最後失敗被俘時，還對曹操說過：「明公（曹操）所患不過於（呂）布，今已服矣，天下不足憂。明公將步，令布將騎，則天下不足定也。」（《三國志·魏志·呂布傳》）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呂布是仍以自己統率騎兵作戰的才能自詡的。《三國志·魏志·呂布傳》說：「（呂）布有良馬曰赤兔，常與其親近成廉、魏越等陷鋒突陣。」不但在這次戰鬥中，「陷鋒突陣」，幾乎貫穿了呂布這支騎兵作戰的全部歷程。可以設想，呂布如此，張遼、張楊也是如此，并州軍事集團應該是以運用騎兵衝鋒陷陣見長的。由於這個軍事集團所具有的這種長處，以致曹操與袁紹在官渡相持時，曹操的主要謀士荀彧還認為「不先取呂布，河北未易圖也」（《三國志·魏志·荀彧傳》）。當呂布一旦為曹操消滅，曹、袁之間決戰也就展開了。

《三國志·魏志·呂布傳》說：「（呂）布雖驍猛，然無謀而多猜忌，不能制御其黨，但信諸將。諸將各異意自疑，故每戰多敗。」又同《傳》裴松之注引《英雄記》說：「（呂）布謂太祖（曹操）曰：『布待諸將厚也，諸將臨急皆叛布耳。』太祖曰：『卿背妻，愛諸將婦，何以為厚？』布默然。」呂布勇而無謀，缺乏作戰部署，也缺乏對部屬的統率能力，加以內部相互猜忌，彼此之間不團結；而所謂「但信諸將」，也是有條件的，對大將高順的日益疏遠，並奪取高順部眾與所親信的魏續，即是顯著的一例（《三國志·魏志·呂布傳》及裴松之注引《英雄記》）。並且如《英雄記》所說，呂布和諸將妻子之間還存

在着某種曖昧關係。呂布的最後失敗被殺，就是侯成、宋憲，包括所親信的魏續等諸將背叛投降的結果（《三國志·魏志·呂布傳》及裴松之注引《英雄記》）。

以呂布為中心的并州軍事集團，是一支具有特殊戰鬥力的軍事力量，在東漢末年的戰爭年代，他們曾成為擁有強勁武裝的割據勢力，扮演過重要角色。但是，以他們本身所具有的弱點，加以一貫被人利用，又必然成為曇花一現的人物，終於為曹操所消滅。

⑨ 作為「遊俠」之士的曹操

曹操的父親曹嵩是大宦官曹騰的養子，「莫能審其生出本末」（《三國志·魏志·武帝紀》），這是一個來歷不明的人。「建安七子」之一的陳琳，後來在所作《為袁紹檄豫州》一文中，曾指斥曹嵩是「乞巧攜養」，而曹操本人則是「贅闖遺醜」（《文選》卷四四），強調了曹操出身於大宦官家庭。正是這樣一個曹操，為甚麼會得到那些反宦官力量的重視和信任，並參與了以袁紹為主謀的誅除宦官的鬥爭？關鍵在於，曹操是袁紹的親密朋友。

《三國志·魏志·袁紹傳》說：「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也。高祖父（袁）安，為漢司徒。自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由是勢傾天下。（袁）紹有姿貌威容，能折節下士，士多附之。太祖（曹操）少與交焉。」說明由於袁紹的「折節下士」，在他的結納下，曹操和袁紹兩人，早在京師洛陽時就建立了友誼。曹操的父親曹嵩曾為「司隸校尉，靈帝擢拜大司農、大鴻臚，代崔烈為太尉」（《三國志·魏志·武帝紀》注引《續漢書》）；袁紹的父親袁逢也是三公，兩人都是大官僚家庭的貴公子。更為重要的還是，曹操是遊俠，袁紹也是遊俠。《三國志·魏志·武帝紀》說：「太祖（曹操）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同書《袁紹傳》注引《英雄記》也說：「（袁紹）又好遊俠，與張

孟卓、何伯求、吳子卿、許子遠、伍德瑜等皆為奔走之友。」性格志趣相同，這才是曹操和袁紹兩人建立友誼的基礎。

作為遊俠的曹操和袁紹還有着兩個著名的故事。《世說新語·假譎》說：「魏武（曹操）少時，嘗與袁紹好為遊俠，觀人新婚，因潛入主人園中，夜叫呼云：『有偷兒賊！』青廬中人皆出觀，魏武乃入，抽刃劫新婦與（袁）紹還出，失道，墜枳棘中，（袁）紹不能得動，復大叫云：『偷兒在此！』紹惶迫自擲出，遂以俱免。」又說：「袁紹年少時，曾遣人夜以劍擲魏武（曹操），少下，不著。魏武揆之，其後來必高，因貼臥床上，劍至果高。」儘管這兩個故事的真實性是值得懷疑的，關於後一故事，劉孝標注早已指出其可疑之處。但是，從這著名的故事中，仍可以看出曹操、袁紹之間的關係，也可以看出，當時的遊俠生涯有其放蕩的一面，並反映了曹操個人的機警和權數。

所謂「放蕩」，僅是遊俠的一種表現，當時說來，這遠不是主要的。對於遊俠，同時代的傑出政論家荀悅曾經有所表述，他說：「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遊俠。」又說：「遊俠之本，生於武毅，不撓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見危授命，以救時難而濟同類，以正行之者，謂之武毅，其失之甚者，至於為盜賊也。」（《前漢紀》卷一〇）表面上，這裡所說的是西漢武帝時的情況，而實際卻是指的東漢末年的遊俠，主要就是曹操、袁紹這種類型的遊俠之士。當時，「以救時難而濟同類」，是遊俠的最高準則。所謂「時難」，就是東漢王朝危機四伏，統治者面臨空前嚴重的災難，而宦官控制朝政，則被認為是災難的根源；所謂「同類」，即是指當時反對宦官的人們，包括遊俠在內。